

# 社会经济保障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徐延辉,邱 啸

(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0)

**摘 要:**基于社会质量视角,利用“社会质量视角下的农民工市民化研究”问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方法,从经济资源与就业、住房与环境、社会保险和教育四个维度探讨社会经济保障与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关系。研究发现,大部分农民工并不认为自己是城市的一员,身份认同度较低;参加职业培训、购买商业保险、拥有住房产权和良好的居住条件,以及子女可以在公办学校接受教育有利于提升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的可能性;个人收入、家庭收支状况、劳动合同、社会保险以及居住面积的效应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因此,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保障农民工的居住权利及其子女的受教育权利是提升农民工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社会质量;社会经济保障;身份认同;农民工;社会融入

中图分类号:C 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9)02-0102-10

## 一、引 言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 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 28652 万人,比上年增加 481 万人,增长 1.7%<sup>[1]</sup>,大量农民工从传统乡土社会进入到现代城市社会,生活空间发生了巨大变化,每个人都面临着重新建立自身认同的过程。2017 年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农民工普遍遭遇身份认同危机,只有 38%的人认为自己是所居住城市的“本地人”<sup>[1]</sup>。研究表明,许多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处于模糊状态,成为城市和农村的双重边缘人<sup>[2][3][4][5]</sup>。不仅农民工自身的身份认同模糊,而且其子女也有类似特征,有研究表明,流动人口子女认为自己是“外来人”的占 28.8%，“说不清楚”自己是哪里人的占 46.5%<sup>[6]</sup>,说明有近一半的流动人口子女的身份认同处于模糊状态,这种状况使得农民工及其子女难以融入

到城市当中。

布劳认为,流动的人不能简单地抛弃旧有的角色属性和角色关系,但他们如果不接受和建立新的角色属性,就不能适应他们的新位置<sup>[7]</sup>。社会认同对于个人融入社会,维护个人的本体性安全,防止本体性焦虑,确立生活和道德的方向感等均具有重要作用<sup>[8]</sup>;农民工一旦形成“游民化”的社会认同,就意味着他们意识到自己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就会产生边缘化感觉和意识,难以回归到主流社会<sup>[2]</sup>。身份认同既是集体暴力事件的结构条件,又是其重要的动员因素<sup>[9]</sup>,由于难以完成一个完整的身份认同的循环历程,农民工容易产生愤怒和怨恨的情绪,并卷入各种针对资本的集体行动中<sup>[10]</sup>。所以,身份认同对于农民工群体本身以及整个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只有流动人口对流入地有很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并且认为自己是当地人时,

收稿日期 2018-08-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质量视角下的农民工市民化研究”(15BSH070)

作者简介:徐延辉,厦门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副院长,主要从事经济社会学与社会政策研究;邱啸,厦门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政策研究。

他们才真正融入到流入地的主流社会,有学者认为,心理和文化的适应是流动人口完全融入城市社会的标志<sup>[11]</sup>,身份认同是社会融入的最高境界<sup>[12]</sup>,因此研究农民工身份认同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从社会质量理论入手,聚焦社会经济保障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

## 二、文献回顾

### (一) 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

认同由英文 identity 翻译而来,意为相同或一致。认同最初受到心理学家的关注。埃里克森提出认同是一种熟悉自身的感觉,一种“知道个人未来目标”的感觉,一种从他信赖的人们中获得所期待的认可的内在自信<sup>[13]</sup>。后来,认同概念逐渐扩展到社会学领域,通过社会分类、社会比较和积极区分建立起来的社会认同得到社会学家的关注,社会学所探讨的社会认同主要是指个人对自己从属于特定社会群体的认知,并且群体成员资格对个人具有情感和价值意义<sup>[14]</sup>。

近年来,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得到国内学者关注,研究视角包括社会制度、家庭、社会网络、消费、空间以及社会距离等等。社会制度是学者首先关注的因素。陈映芳指出,农民工作为一个与“农民”和“城市居民”并存的身份类别,是由制度与文化共同建构的第三种身份<sup>[15]</sup>。刘传江、程建林提出了双重“户籍墙”观点,显性与隐性户籍墙的共同作用不断强化着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对于任何移民,家庭在其迁移过程中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家庭因素不仅对个人是否迁移产生影响,而且还影响着个人在迁移后的身份认同<sup>[16]</sup>。史学斌和熊洁的研究发现,住房性质、家庭月收入以及本地亲戚等因素对农民工身份认同具有重要影响<sup>[17]</sup>。史毅的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团聚也是影响其流入地身份认同的关键因素<sup>[18]</sup>。作为社会人,每个人都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所以社会网络对身份认同具有较大影响。蔡禾和曹志刚的研究发现,新生的社会网络可以增进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sup>[19]</sup>。但是也有研究发现,以初级群体为基础的社会网络会限制农民工的交往范围,阻碍农民工对城市

的认同与归属<sup>[11]</sup>。消费既是用于建构认同的“原材料”,又是认同表达的符号和象征<sup>[20]</sup>。消费成为农民工追求身份认同的手段,新生代打工妹通过消费可以摆脱原有身份的制约,追求更平等的身份<sup>[21]</sup>。新生代农民工通过炫耀性消费行为来建构新的社会认同和融入城市生活<sup>[22]</sup>,或者通过模仿市民的消费方式来加强对自身身份的认同<sup>[23]</sup>。

20世纪70年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了“空间转向”,空间不再只被视为一个地理概念,而且还体现和建构着社会关系,空间对个人的身份认同也有一定影响。赵晔琴认为,“农民工”聚居区成为农民工身份认同的一个空间符号,不断强化着农民工对于自身身份的认同<sup>[24]</sup>。潘泽泉和何倩的研究发现,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居住空间距离越近,越有可能认同自己是城市人<sup>[25]</sup>。本文作者使用国家卫计委的数据研究发现,拥有住房产权有利于增加农民工对“本地人”身份的认同,居住的区位越靠近市区,越有利于农民工对本地人身份的认同;与农民工聚居形式相比,居住在以本地人为主的混合社区更有利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sup>[26]</sup>。社会距离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呈负相关关系,即随着社会距离的降低,农民工对于城市人身份的认同程度会不断升高。已有研究发现,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社会距离越小,农民工就越认为自己是城里人<sup>[27][28]</sup>。

### (二) 社会经济保障及其相关研究

社会经济保障概念源于社会质量理论。社会质量指的是人们在提升他们的福祉和个人潜能的条件下,能够参与社会与经济生活的程度<sup>[29]</sup>。社会质量强调人的社会性,作为行动者的个体处于集体认同与自我实现这两方面的辩证关系之中。社会质量包括四个条件性因素,即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团结、社会包容与社会赋权。根据社会质量理论,社会经济保障要求社会保护支持下的高质量、有偿就业,以此来保护人们的生活水准和获得各种资源,包括收入、教育、医疗保健、社会服务、环境、公共健康以及个人安全等;社会凝聚指的是社会关系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维持共享的认同、价值观和规范;社会包容是指人们能够接近并被整合进那些构成日常生活的社会制度及社会关系的

程度;社会赋权指的是个人的力量和能力在何种程度上通过社会关系发挥出来,社会关系能在何种程度上提高个人的行动能力。社会质量关注一个“好的”社会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其中社会经济保障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具有较大影响。已有研究表明,社会经济保障可以增强城市居民的创新意识<sup>[30]</sup>,提升农村居民的社会发展满意度<sup>[31]</sup>,增加居民的幸福感受<sup>[32]</sup>。

社会经济保障与社会保障都是用来衡量人们的福利获得情况的概念,二者之间虽有相似性,但也存在较大不同。在中国大陆,社会保障概念具有很大的伸缩性,有的研究虽然采用社会保障概念,但内容只包括社会保险,实质上是将社会保障等同于社会保险,造成社会保障概念过于狭窄。有的研究则将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混淆在一起,导致社会保障概念过于宽泛。相比而言,社会经济保障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比社会保障更加丰富,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同时社会经济保障具有较为明确的测量指标体系,因此,本文采用社会质量理论中的社会经济保障概念,探索社会经济保障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以期对推进社会政策理论研究和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实践有所贡献。

### (三) 社会经济保障与身份认同

工作和收入是农民工在城市落脚的基础,收入可以促进农民工的身份认同<sup>[33][34]</sup>。近年来,农民工迁移出现了家庭化的趋势,家庭的收入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逐渐凸显。研究发现,家庭月收入与个人月收入对农民工身份认同具有积极作用,且家庭收入的作用更突出<sup>[17]</sup>。农民工在城市中处于边缘地位,加之自身的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比较薄弱,难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劳动合同对于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至关重要。如果遇到权益受损的情况,劳动合同可以有效地维护他们的合法利益,从而增强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整体而言,农民工的职业等级处于较低层次,这与他们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有关,通过职业培训,可以有效提升他们的技能水平,适应激烈的竞争,最终在城市中立足并实现社会流动<sup>[35]</sup>。

如果在城市中拥有自己的住房,农民工就可

能凭着住房产权获得城市户口,实现身份转变。拥有住房产权能在心理上减少农民工的漂泊感,增强对城市人的身份认同。谢若登指出,资产具有促进家庭稳定、创造未来取向以及增加个人效能等一系列福利效应<sup>[36]</sup>,而住房作为一种不动产,同样具有这些效应。拥有住房所有权可以使农民工在城市中不断积累财富,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扩大交际范围,从而逐渐认同本地人身份,最终融入城市。居住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工的生活质量。较大的居住面积和良好的居住设施意味着较高的生活水平,可以进一步增加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

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工更多从事脏乱差的工作,在工作中面临的风险也更多,因此,参加社会保险,尤其是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对于应对生活中的风险而言至关重要。拥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可以降低农民工离职意愿<sup>[37]</sup>,有助于增加他们工作和生活的稳定性,使其更加认同城市人身份。商业保险反映了个人通过市场获得的保障,如果农民工能够拥有商业保险,意味着他们拥有更强的经济实力留在城市中,对其城市人身份认同也会有积极作用。

对于举家迁移的农民工,如果其子女能够享受到与市民子女同等的受教育机会,那么一方面会促进农民工在城市更稳定地居住和生活;另一方面,获得比农村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也为农民工子女实现社会流动提供了保障,因此子女受教育机会对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也有较大影响。

以上4个方面即为社会经济保障的核心内容,也是本研究拟考察的核心变量。本研究假设以上4个方面对农民工身份认同均有影响。

## 三、数据来源、变量操作化及研究方法

###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质量视角下的农民工市民化研究”课题。课题组于2016年1~3月在厦门、苏州、深圳、东莞等地展开大规模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在流入地居住一个

月以上且年龄在15~64岁的农民工。由于难以找到完整的抽样框,本研究采取配额抽样方法进行抽样。首先按照城市配额,每个城市的样本数不少于300;其次按照性别配额,尽可能保证男女比例均衡;最后按照职业配额,根据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农民工中以受雇方式就业者占83.4%,就业行业分布以制造业所占比重最大<sup>[38]</sup>。根据这一数据,课题组按照企业问卷数量与社区问卷数量4:1的比例发放问卷。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1370份,回收1350份,有效问卷1291份。

## (二) 变量操作化

### 1. 因变量: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自己属于某一社会范畴或群体的自我意识及其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的认可,是人们对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位置、角色、形象和与他人关系的性质的接受程度<sup>[20]</sup>。本文用“您觉得自己是所在地城市的一员吗”一题来测量身份认同,回答“是”赋值为1,回答“否”或“说不清楚”赋值为0。

### 2. 自变量:社会经济保障

根据社会质量理论,本研究将社会经济保障分为经济资源与就业、住房与环境、社会保险和教育4个方面。

(1) 经济资源与就业包括家庭收支状况、个人收入、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是否参加职业培训。个人收入通过询问被调查者年收入来获得,由于收入呈偏态分布,所以对收入取对数。家庭收支通过询问被调查者过去一年中家庭的收支平衡状况来测量,答案包括“要借款”、“需动用储蓄”、“收支相抵”、“有余款储蓄”,分别赋值为1~4。劳动合同用“您和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了吗”一题来测量,“签了”赋值为1,“没签”和“不需要签”赋值为0。职业培训用“在过去三年中,您有没有参加过职业培训或拜师学艺”一题来测量,“有”赋值为1,“没有”赋值为0。

(2) 住房与环境用住房产权、住房面积和住房周围设施测量。本文将“自购房”视为有住房产权并赋值为1,“出租房”、“单位宿舍、寄住亲友家、寄住雇主家”、“单位工棚或自搭简易住房”以及“其

他”视为无住房产权,赋值为0。住房面积通过“您目前的住房面积大约是\_\_\_\_平方米”一题来获得。住房周围设施的计算方法是询问调查对象住所周边是否有以下设施:诊所/药店、小学/中学、公共交通站点、超市/便利店、银行/ATM机、公园/绿地/广场、正规医院、社区图书馆/图书室。对每一类设施,“有”记为1,“没有”记为0,然后将8个项目的得分相加。

(3) 社会保险用“您所在企业(或单位)有没有给您买保险”、“您自己有没有购买商业保险”这两个问题来测量,“有”赋值为1,“没有”赋值为0。

(4) 教育用“您孩子在哪儿上学”来测量,在“公办学校”赋值为1,“在民办学校”或“在老家上学”赋值为0。

## (三) 研究方法

由于因变量是二分变量,所以本文采用二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方法(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可以分析因变量在各个类别之间发生转变的概率,即在控制其他自变量的情况下,可以对某一特定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进行分析,从而检验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

## 四、研究发现

### (一) 农民工身份认同的描述性分析

表1展示了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描述性分析结果。总体来看,有32.7%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城市一员,67.3%的农民工则持有相反的观点,这说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度并不高。已有研究也有类似发现,蔡禾和曹志刚通过对珠三角农民工的调查发现,51.7%的农民工并不认同“自己属于这个城市”<sup>[19]</sup>;国家卫计委2014年的数据显示,只有20%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是本地人。以上研究和调查涉及不同的城市和区域,虽然数据存在差异,但是农民工对于流入地城市的认同程度较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就控制变量而言,在性别方面,男性中有39.6%的人认为自己是城市的一员,女性的比例为32.2%,略低于男性。在年龄方面,农民工年龄越

大,认为自己是所在地一员的比例越低,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是本地人的比例要高于老一代农民工。在教育程度方面,总体来看,受教育程度越高,认同自己是城市一员的比例越高;具体而言,受教育程度是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城市一员的比例分别是 18.8%、33.9%、33.4%、38.2%。从居住时间来看,呈现出居住时间越长,认同本地人身份的比例越高的特点。此外,没有伴侣的农民工认同自己是城市一员的比例为 35%,略高于有伴侣的农民工(31.9%)。

在个人收入方面,农民工的收入主要集中在 1000~5000 元之间;农民工对于所在城市的认同的比例也基本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升。从家庭收支状况来看,农民工的家庭收支状况并不是很好,整个家庭能够实现有余款储蓄的农民工大约占 35%;不同家庭经济状况的农民工认同自己是本地人的比例分别是 33.1%、28.7%、31.9%、34.9%,彼此之间相差不大。签订劳动合同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认同本地人身份的比例差别不大,两者分别为 33.4%和 31.8%。参加职业培训的农民工的比重依然较低,参加职业培训的农民工中有 41.2%的人认为自己是城市的一员,而没有参加职业培训的农民工只有 27.8%的人认为自己是城市的一员。

在商业保险方面,农民工拥有商业保险的比例非常低(12%),拥有商业保险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城市一员的比例是 48.4%,没有商业保险的农民工则为 30.1%。拥有城市社会保险的农民工数量远多于没有城市社会保险的农民工,但二者在认同城市一员身份比例上差别不大。

在住房产权方面,拥有住房产权的农民工中有 59.2%的人认同本地人身份,没有住房产权的农民工只有 30.5%,两者相差达 28.7%。就居住面积而言,农民工的居住面积普遍比较小,居住面积低于 20 平方米的农民工的比例达到 53.4%;居住面积越大,农民工认同自己是城市一员的比例越高。农民工住所周边的居住设施越多,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城市一员的比例越高,住所周边设施 0~4 项、4~6 项以及 6~8 项的农民工认同自己是所在城市

一员的比例分别为 20.9%、29.3%和 39.1%。

在子女受教育方面,子女在公办学校上学的农民工中,有超过一半的人(53.1%)认同本地人身份,而子女不在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只有 27.4%,两者差距明显。

表 1 农民工身份认同的描述性分析

自变量		身份认同		
		不是城市一员(%)	是城市一员(%)	
全体农民工(1243)		67.3	32.7	
控制变量	性别	0=女性(625)	67.8	32.2
		1=男性(599)	66.4	39.6
	年龄	1=16~26岁(401)	64.8	35.2
		2=26~44岁(702)	68.4	31.6
		3=45岁及以上(138)	68.8	31.2
	受教育程度	1=小学及以下(112)	81.3	18.8
		2=初中(496)	66.1	33.9
		3=高中/中专(452)	66.6	33.4
		4=大专及以上学历(165)	61.8	38.2
	有无伴侣	0=无伴侣(371)	65.0	35.0
		1=有伴侣(852)	68.1	31.9
	居住时间	1=1年及以下(206)	75.7	24.3
		2=1~3年(258)	67.8	32.2
		3=3~5年(184)	72.8	27.2
		4=5~10年(324)	66.0	34.0
5=10年以上(251)		59.0	41.0	
经济资源与就业	个人月收入	1=1000元及以下(37)	64.9	35.1
		2=1000~3000元(644)	71.4	28.6
		3=3000~5000元(459)	63.4	36.6
		4=5000元以上(82)	56.1	43.9
	家庭收支状况	1=要借款(121)	66.9	33.1
		2=需要动用储蓄(108)	71.3	28.7
		3=收支相抵(540)	68.9	31.9
		4=有余款储蓄(436)	65.1	34.9
	劳动合同	0=未签订劳动合同(330)	68.2	31.8
		1=签订劳动合同(875)	66.6	33.4
职业培训	0=没有职业培训(752)	72.2	27.8	
	1=有职业培训(452)	58.8	41.2	
社会保险	0=无商业保险(1074)	69.5	30.5	
	1=有商业保险(157)	51.6	48.4	
城市社会保险	0=无城市社会保险(362)	69.9	30.1	
	1=有城市社会保险(772)	65.8	34.2	
住房与环境	住房产权	0=无住房产权(1145)	69.5	30.5
		1=有住房产权(98)	40.8	59.2
	居住面积	1=10平方米及以下(202)	70.8	29.2
		2=10~20平方米(414)	72.5	27.5
		3=20~40平方米(237)	69.6	30.4
		4=40平方米及以上(301)	56.8	43.2
	居住设施	1=0~4项(215)	79.1	20.9
		2=4~6项(403)	70.7	29.3
		3=6~8项(553)	60.9	39.1
教育	子女受教育	0=不在公办学校(536)	72.6	27.4
		1=在公办学校(147)	46.9	53.1

## (二) 农民工身份认同的逻辑斯蒂回归分析

为了更好地研究社会经济保障的不同维度对身份认同的作用,本文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依次将不同的自变量放入模型。本文建立了 4 个模型,依次放入经济资源与就业、社会保险、住房与环境和教育 4 个维度的变量,结果见表 2。分析显示,4 个模型拟合效果良好,本文接下来主要报告不同变量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回归结果。

在模型 1 中,除了放入控制变量之外,还加入了个人月收入对数、家庭收支状况、劳动合同、职业培训 4 个变量,通过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只有职业培训这一变量具有统计显著性,即相对于没有参加职业培训的农民工,参与职业培训的农民工认同自己是城市人的可能性要高 77.2%。个人月收入对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与一些研究发现相同<sup>[3][34][39]</sup>。这可能是因为客观经济地位并不影响农民工的身份意识,真正产生影响的是他们以城市居民为参照群体对自己地位的感知<sup>[3]</sup>。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如果与留在农村的人相比,其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强他们对城市的认同;如果与城市居民相比,他们会发现彼此之间差距较大,这样就会降低他们对本地人身份的认同。所以,农民工对于自身收入与所选择的参照群体的主观比较才真正对他们的身份认同产生影响。家庭收支状况对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目前,农民工的迁移呈现家庭化趋势,本研究数据显示,90.3%的农民工至少与一位家庭成员居住在一起。家庭的经济状况对于农民工全面融入城市尤其是实现身份认同至关重要,已有研究发现,家庭收入能够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居留意愿<sup>[40][41]</sup>,增强农民工的身份认同<sup>[17][42]</sup>。本研究的结论之所以与这些结论不一致,可能存在以下两个原因:第一,本研究对于家庭收支状况测量只包括“要借款”、“需动用储蓄”、“收支相抵”、“有余款储蓄”四类,与用家庭收入来测量相比,获得的信息较少;第二,家庭收支状况对于身份认同也可能存在其他的影响机制,即家庭收支状况可能通过其他变量来影响农民工的身份认同,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

内容。签订劳动合同对于农民工身份认同的效应也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与一些研究结论并不一致<sup>[43]</sup>。从理论上来看,劳动合同能够增加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确保其获得稳定持续的收入,同时也可以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从而提升农民工的身份认同<sup>[42][44]</sup>。在本研究中,有 80.2%(包括个体工商户在内)的农民工签订了劳动合同,虽然劳动合同的覆盖率很高,但在遇到侵权事件时,由于农民工自身的维权意识比较薄弱,加之通过劳动合同维护自身权益需要耗费较多的财力和物力,许多农民工不得不选择放弃,劳动合同在实践中的作用相对有限。

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了城市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变量,通过模型结果可以发现,职业培训变量仍然具有统计显著性,并且回归系数变化不大。商业保险变量具有统计显著性,购买商业保险的农民工认同自己是城市一员的可能性要比没有购买商业保险的农民工高 115.8%。在城市社会保险方面,与没有购买城市社会保险的农民工相比,购买城市社会保险的农民工认同自己是城市一员的可能性要增加 46.3%,但是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与目前一些研究结论不同<sup>[42][43]</sup>。本研究的数据显示,只有 67.6%的农民工购买了社会保险,社会保险覆盖率相对较低,造成研究结果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另外,城市社会保险包括养老、医疗、工伤、生育保险等不同种类,而本研究只是从整体上予以讨论,分开讨论不同类型社会保险对于农民工身份认同的作用可能会有不同发现。

模型 3 进一步加入了住房产权、住房面积和住房周边设施 3 个变量。回归结果显示,职业培训和商业保险变量依然具有统计显著性。在新加入的 3 个变量中,住房产权和住房周边设施具有统计显著性。具体而言,拥有住房产权的农民工更有可能认为自己是城市的一员,其可能性是没有住房产权的农民工的 3.94 倍,这与相关的研究结论一致<sup>[34][45]</sup>。住房周边设施越齐全,农民工越有可能认为自己是城市的一员,住房周边设施每增加 1 单位,农民工认同自己是城市一员的可能性就增加 16.3%,这可能是因为住房周围设施越齐全,意味着农民工更有可能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共

服务,进而提升了他们的身份认同。居住面积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一般而言,居住面积越大,意味着农民工的经济实力越强,越有能力留在城市中。从消费的角度来看,居住面积越大,表明农民工在住房消费中的投入越大,有研究发现农民工的住房消费越多,越有可能认为自己处于较高的阶层<sup>[46]</sup>,这有助于缩小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也使得农民工更有可能认为自己是城市一员。本研究数据显示,租房和拥有自购房的农民工的人均居住面积仅为10.76平方米,明显低于全国进城农民工的平均水平(19.4平方米),因此,农民工的居住面积普遍较小可能使研究结果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模型4则是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子女受教育变量。可以发现,子女在公办学校上学对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具有统计显著性,即子女在公办学校上学的农民工认同自己是城市一员的可能性是子女在私立学校或在老家上学的农民工的2.14倍。在模型4中,职业培训、商业保险、住房产权和住房周边设施仍然具有统计显著性,并且回归系数变化很小,说明这些变量是影响农民工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

在控制变量方面,只有居住时间在模型1和模型2中具有统计显著性,其他的研究也有类似结论<sup>[18][34]</sup>。一般而言,居住时间越长,农民工更有可能积累较多的财富并建立新的社会网络,有能力并且有意愿在城市中生存和发展。另外,居住时间的增长,意味着农民工逐渐适应城市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逐渐习得城市居民的生活习惯,从而更加认可自己是城市一员。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有无伴侣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性别、年龄以及受教育程度对于农民工身份认同的作用,目前的研究结论差别较大,甚至存在相反结论。比如,有研究发现男性比女性更容易认同本地人身份<sup>[17][47]</sup>,有的则发现男性对于本地人身份的认同度要低于女性<sup>[25]</sup>;此外,也有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差异<sup>[18][43]</sup>。由于这些变量不是本研究关注的焦点,所以不详细展开分析。

表2 农民工身份认同二元逻辑斯蒂回归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β	Exp(β)	β	Exp(β)	β	Exp(β)	β	Exp(β)
男性 <sup>a</sup>	-.084	.919	-.075	.928	.007	1.007	.073	1.076
年龄	.013	1.013	.008	1.008	.011	1.011	.004	1.004
有伴侣 <sup>b</sup>	-.091	.913	.006	1.006	.068	1.070	.083	1.086
受教育年限	.043	1.044	.019	1.019	-.012	.989	-.011	.989
居住时间	.045	1.046	.042	1.043*	.023	1.023	.010	1.010
经济资源与就业								
个人月收入对数	-.150	.861	-.314	.731	-.411	.663	-.387	.679
家庭收支状况	.220	1.246	.156	1.168	.250	1.284	.273	1.313
签订劳动合同 <sup>c</sup>	-.182	.834	-.417	.659	-.492	.611	-.510	.600
参加职业培训 <sup>d</sup>	.572**	1.772	.506*	1.659	.521*	1.683	.462*	1.588
社会保险								
在城市购买社会保险 <sup>e</sup>			.381	1.463	.321	1.378	.262	1.299
购买商业保险 <sup>f</sup>			.769**	2.158	.547*	1.729	.490 <sup>g</sup>	1.632
住房与环境								
住房产权 <sup>g</sup>					1.371**	3.940	1.299**	3.418
住房面积					-.002	.998	-.004	.996
住房周边设施					.151*	1.163	.149*	1.161
教育								
子女在公办学校上学 <sup>h</sup>							.761**	2.140
常数	-1.501	.223	.207	1.230	.066	1.069	.075	1.078
样本量	1089		992		892		500	
-2LL	619.507		609.166		588.070		579.872	
Nagelkerke R方	.051		.079		.133		.153	

注: ! p< 0.1; \* p<0.05; \*\* p<0.01; \*\*\* p<0.001。

参照组:a.女性,b.没有伴侣,c.没有签订劳动合同,d.未接受职业培训,e.没有购买城市社会保险,f.没有购买商业保险,g.没有住房产权,h.子女不在公办学校上学。

### 五、研究结论及讨论

本文基于社会质量视角,采用定量分析方法,探讨了社会经济保障与农民工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参加职业培训有利于促进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而言,参加职业培训是提升人力资本的重要手段,因为参加职业培训可以提高农民工的技术水平,增强他们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帮助其获得较好的工作,使他们有能力留在城市中。个人收入和家庭收支状况并没有

对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产生影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虽然收入是农民工实现市民化的基础,但是在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只是基于经济人的假设,单纯地增加农民工收入并不能真正提升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促进身份认同,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系统的工程,社会经济保障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促进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基础,我们需要在广义的社会经济保障概念下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超越“生存—经济”的叙事模式<sup>[48]</sup>。

第二,购买商业保险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的身份认同。能够购买商业保险的农民工经济实力较强,比其他农民工更有能力留在城市中。此外,拥有商业保险意味着在遇到困难时多了一份保障,有助于增强农民工留在城市的信心,从而促进他们的身份认同。城市社会保险对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在马歇尔的市民权理论中,社会权利在市民身份概念中居于核心地位,社会权利是指一系列从少量经济福利及保障到充分享受社会传统与由社会呈现出的文明生活标准的权利<sup>[49]</sup>。社会保险是社会权利的重要体现,对于农民工而言,当他们面临工伤、疾病等风险时,城市社会保险可以增加他们应对这些风险的能力。另外,拥有城市社会保险体现了城市社会对于农民工的接纳,意味着农民工在形式上获得了与城市居民平等的权利,具有重要的符号价值。但是在本研究中城市社会保险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其中原因需要未来进一步探讨。

第三,拥有住房产权和良好的住房周围设施可以增进农民工的身份认同。这是因为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住房对任何一个人,包括农民工,都是非常重要的,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意味着在城市中拥有立足之地,意味着生活的安稳。但是仍然需要注意,拥有住房产权并不一定能够自动实现身份认同,还要考虑到住房周围设施状况等因素。住房周围设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公共服务的供给状况,良好的基础设施意味着可以享受更多的公共服务,这有助于提升农民工对城市政府的满意度,进而增强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

第四,子女在公办学校接受教育可以促进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目前许多城市对于外来务工人

员子女入学都采取积分制,按照积分高低来确定子女是否可以在城市公立学校入学,这项制度既为部分农民工子女提供了受教育机会,同时也将许多农民工子女排斥在外,农民工不得不将子女送到其他城市或者老家就学,降低了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此外,政府不仅要保障农民工子女基本的受教育权利,还需要保证受教育的质量,使农民工子女能够有机会到较好的学校接受初中、高中教育,这涉及教育公平问题,值得专门撰文进一步探讨。

总体而言,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变量都具有统计显著性,但是本研究的发现依然可以表明社会经济保障是促进农民工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在理论层面,从市民权的角度来看,由于户籍制度的作用,农民工并没有享受到完整的市民权,而是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歧视。不管是参加职业培训、拥有住房产权和良好的居住设施,还是子女可以在公办学校接受教育,这都体现了农民工的市民权不断得到实现,这势必可以促进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基于社会流动的角度,对于农民工本人或者其子女而言,参加职业培训、拥有良好的居住设施以及接受良好的教育是他们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和手段。王春光早在2001年就提出农民工在制度、日常生活和行动以及社会心理方面呈现出“半城市化”状态<sup>[2]</sup>。虽然我国政府不断采取措施促进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但是近年来的一系列社会调查数据和科学研究的结果均发现,农民工对于本地人身份的认同感普遍较低,并不把自己视为城市一员<sup>[119]</sup>。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政策仍然是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实现身份认同的重要工具。研究表明,未来的社会政策在职业培训、居住空间以及基础教育等方面,均有较大的提升和创新空间,从而不断增加社会政策在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方面的“精准性”。

#### 参考文献:

- [1] 国家统计局.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4/t20160428\\_1349713.htm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4/t20160428_1349713.html), 2018-04-27.
- [2]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

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1,(3):63-76.

[3] 许传新.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J].学术探索,2007,(3):58-62.

[4] 彭远春.论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对武汉市杨园社区餐饮服务员的调查分析[J].人口研究,2007,31(2):81-90.

[5] 杨宜音.新生代农民工过渡性身份认同及其特征分析[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5(5):76-85.

[6] 许传新.公办学校流动人口子女的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农村观察,2008,(6):22-27.

[7] 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M].张黎勤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257.

[8] 孔娜娜.认知、服务、参与:新生代农民工认同建构与社区融入[J].学习与实践,2013,(2):68-73.

[9] 王国勤,洪桑桑.身份认同与集体暴力[J].国外理论动态,2016,(2):111-118.

[10] 卢晖临,潘毅.当代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情感与集体行动[J].社会,2014,34(4):1-24.

[11] 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J].江海学刊,2002,(6):82-88.

[12] 杨菊华.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9,33(1):17-29.

[13] Erikson E.H.Identity and life Cycle [M].New York:Norton,1959.118.

[14] Tajfel H.Social Categorization,Social Identity and Social Comparison[A].In Tajfel H.(Eds),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 Studie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C].London:Academic Press.1978.63.

[15] 陈映芳.“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J].社会学研究,2005,(3):119-132.

[16] 刘传江,程建林.双重“户籍墙”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J].经济学家,2009,(10):66-72.

[17] 史学斌,熊洁.家庭视角下外来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重庆的调查[J].农村经济,2015,(7):120-124.

[18] 史毅.户籍制度与家庭团聚——流动人口流入地的身份认同[J].青年研究,2016,(6):11-20+91.

[19] 蔡禾,曹志刚.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及其影响因素——来自珠三角的实证分析[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9(1):148-158.

[20] 王宁.消费与认同——对消费社会学的一个分析框架的探索[J].社会学研究,2001,(1):6-16.

[21] 余晓敏,潘毅.消费社会与“新生代打工妹”主体性再造[J].社会学研究,2008,(3):143-171.

[22] 金晓彤,崔宏静.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建构与炫耀性消费的悖反性思考[J].社会科学研究,2013,(4):104-110.

[23] 纪江明,陈振营,赵毅.新生代农民工“二元化”消费方式与身份认同研究——基于2010年上海市外来农民工的调查[J].人口与发展,2013,19(2):2-9.

[24] 赵晔琴.农民工:日常生活中的身份建构与空间型构[J].社会,2007,27(6):175-188.

[25] 潘泽泉,何倩.居住空间、社会交往和主观地位认知: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17,(1):80-87.

[26] 徐延辉,邱啸.居住空间、社会距离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11):127-136.

[27] 闫伯汉.制度排斥、社会距离与农民工社会融入——基于广东省东莞市的分析[J].北京社会科学,2015,(5):65-72.

[28] 陈延秋,金晓彤.心理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基于社会距离的中介作用[J].青年研究,2016,(1):30-38.

[29] Beck W., Maesen van der Laurent & A. Walker (eds). The Social Quality of Europe. The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7.346.

[30] 徐延辉,兰林火.社会质量视域下城市居民创新意识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014,(2):77-86.

[31] 张新文,詹国辉.社会质量与社会发展的满意度是否关联?——基于江苏农村(2005—2014年)的分析[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9(3):100-107.

[32] 韩莹莹.社会质量与居民幸福感——以广东四县(区)为考察对象[J].中国行政管理,2016,(8):109-114.

[33] 李荣彬,袁城.社会变迁视角下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实证研究——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J].人口与发展,2013,19(6):26-35.

[34] 褚荣伟,熊易寒,邹怡.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决定因素研究:基于上海的实证分析[J].社会,2014,34(4):25-48.

[35] 徐延辉.教育救助与社会流动[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

[36] 迈克尔·谢若登.资产与穷人:一项新的美国福利政策[M].高鉴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81.

[37] 朱红根,刘磊,康兰媛.制度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10省市的调查数据[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4,13(5):524-529+536.

[38] 国家统计局,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4/t20160428\\_1349713.htm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4/t20160428_1349713.html),2017-04-28.

[39] 孟颖颖,邓大松.农民工城市融合中的“收入悖论”——以湖北省武汉市为例[J].中国人口科学,2011,(1):

- 74-82.
- [40] 孟凡礼, 谢勇, 赵霞. 收入水平、收入感知与农民工的留城意愿[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6): 55-62.
- [41] 杨巧, 李鹏举. 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发展能力与城市居留意愿——基于 2014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 2017, (10): 50-56+49.
- [42] 陆万军, 张彬斌. 就业类型、社会福利与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来自微观数据的经验证据[J]. 经济学家, 2018, (8): 34-41.
- [43] 王丽丽, 梁丹妮. 两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身份认同影响因素的异同[J]. 城市问题, 2017, (2): 97-103
- [44] 谢勇. 就业稳定性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研究——以江苏省为例[J]. 农业经济问题, 2015, 36(9): 54-62+111.
- [45] 韩俊强. 农民工住房与城市融合——来自武汉市的调查[J]. 中国人口科学, 2013, (2): 118-125.
- [46] 赵晔琴, 梁翠玲. 融入与区隔: 农民工的住房消费与阶层认同——基于 CGSS 2010 的数据分析[J]. 人口与发展, 2014, 20(2): 23-32.
- [47] 李荣彬, 张丽艳. 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我国 106 个城市的调查数据[J]. 人口与经济, 2012, (4): 78-86.
- [48] 王小章. 从“生存”到“承认”: 公民权视野下的农民工问题[J]. 社会学研究, 2009, (1): 121-138.
- [49] Marshall T.H.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and Other Essays[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0. 10-11.

【责任编辑: 龚紫钰】

## Social Economic Security and Migrant Workers' Identity

XU Yan-hui, QIU Xiao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0)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quality and on the basis of the data from “Research on Migrant Workers’ Integration into Urban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Qualit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economic security and migrant workers’ identity from four dimensions of economic resources and employment, housing and environment, social insurance and education by using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ethod. The study shows most migrant workers do not consider themselves as part of the city, and that receiving vocational training, purchasing commercial insurance, home ownership, good living condition and their children’s access to education in public schools may make migrant farmers more identify with the city, while individual income, family income and expenditure, labor contract, social insurance and living area a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factors. Therefore, more efforts in vocational training for migrant workers, safeguarding their residential rights and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rights are essential to making migrant workers’ more identify with the urban society.

**Key words:** social quality; social economic security; identity; migrant workers; social inclusion